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化复兴的概观

张 琢

〈爱知大学〉

摘 要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的变迁过程。其最突出的变化是经济体制上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这种转型相伴的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府职能、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渗透于这一整体变迁过程的灵魂——它在改革开放肇始时，开明的意识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同时，积久形成的僵化的保守的意识又束缚和阻碍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思想观念的矛盾运动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这一变迁生动地展现于从大众世俗文化生活到上层精英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

在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与亚洲·世界的文化共生”研究会召开的多次文化专题研讨会和学术报告会上，与会者就中国文化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报告人及提出的论文从精英、大众与民间文化的分层，到各个层面的具体的专门领域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本研究会的研究开始是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切入的，2003 年首届国际研讨会的题目是“新启蒙、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现代化论及后现代问题”；由于自 2004 年以来，陆续加入本研究会的成员多属从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等伴生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相应受邀与会和讲学的这些方面的专家也较为集中，较多地展示了这些领域（主要为世俗生活）的状况和研究成果。

本文，首先从总体上勾画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化现象出现和演变的社会背景；然后着重对文化构成中处于神经中枢地位的学术文化作概括性介绍。前者以时间为顺序，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线索，用代表性指标及各个时期的国际反应与评价，描绘出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文化现象发生与演变的背景轮廓。后者，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复兴状况的概观。述评的主要学科是：人文学科领域的哲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法学研究。所涉各学科内容主要限于其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

行文取虚实结合的方法进行述评：学科动态、重大成果、争论热点、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因各学科发展不平衡、各有千秋，笔者便也不拘一格，因学科而异，自由点评。内容和观点均属个人管窥之见，率性而言，自负文责。

关键词 改革开放、整体变迁、学术文化、文·史·哲、经·社·政、复兴·发展

一. 文化复兴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性社会变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诸要素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文化复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同推进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解放是整个社会经济改革的先导，并伴随着经济、社会、政治变迁的全过程；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行为规则、风俗习惯及价值取向的变化则更是社会变迁的最直接、最生动的反映和体现。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第 11 届中央委员会第 13 次会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是随着此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渐次展开，不仅改变了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并进而越来越大地影响着世界各方面的格局而逐步升级的。

笔者认为：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它是自1921年成立以来，历尽艰辛和曲折，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走上了一条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的标志。就中国历史而言，它是自商鞅变法以后，第二次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变革与创新——前者废除了中国农业文明时代开启以来逐步形成的本土型的封建宗法制度，确立了皇帝集权、行政分层、选贤任能的宗法专制制度；后者则是自19世纪中叶，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外烁下，被动地走上由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产业社会变迁之路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推进经130余年的坎坷历程而陷入困境之际，绝路重生的转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发展趋势看，中国有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预期目标[1]。

人们对中国1978年改革对世界的影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认识和评价，也是随着中国的发展成效的彰显，而逐步深化和提高了：改革开始时，外界对其内容和走向如雾里看花，知之甚少而且极为表面，处于惊异和猜疑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突破一道道难关逐步推进，成效初显，外界对中国的国情与改革的举措了解日渐增多，逐步释疑，舆论呈正面肯定和期待。改革进而向纵深发展，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层出不穷地显露出来，大大小小的经济难关和社会事件时有发生，尤其1989年春的政治风波，令外界的中国观察和反应又陷入新的困惑和矛盾的状态：震惊与谴责，制裁与声援，担忧与观望，混沌交织，其中最流行的为“崩溃论”；但是中国的经济却仍像一辆越野车一样，稍经踟蹰调整，又开足马力，继续颠簸着高速奔驰。

到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年之际，已超额实现了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中国国家统计局核算的该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含香港、澳门、台湾，下同）已达89677亿元人民币[2]，世界银行数据库按名义汇率显示的数据为9914亿美元[3]。而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当年已达41122亿（国际）美元，跃升为世界第二。不过，按人均量计算仍仅为3291国际美元，为美国人的10.8%、日本人的13.7%，列世界第128位[4]。

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腐败、利益失衡、环境与资源及其它发展中的问题日益突显。本来，社会变迁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尤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出现社会失范更是必然现象。世界上从来没有毫无弊病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是在不断突破旧的桎梏、克服旧的弊病的同时又不断迎战新产生的困难和问题的矛盾中推进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失衡，尤其政治改革的滞后，更使社会问题丛生：干部腐败渎职，特别是“一把手”们的权力寻租触目惊心，黄、赌、毒、黑泛滥成灾，刑事犯罪居高不下，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劳工阶层利益受损，失地和贫困农民的生活缺乏保障，城乡间、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个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这一切不仅直接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安，尤其是利益受损阶层的不满和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及民粹主义情绪的反弹，也引发了学术界的深切关注、忧虑和讨论。

面对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矛盾多变的现象，外界对中国的局势的评论和预测，也乱纷纷：赞誉与诋毁，羡慕与嫉妒，亲和与遏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

新世纪伊始，2001年中国得以加入了世界经贸组织（WTO），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实现与国际接轨。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换届后的领导班子，面对现实，吸取中共及中外历史的各方经验教训，采取“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应对上述各方面的矛盾以构建“和谐社会”。并进而把根植于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5]的哲学思想与求同存异的和合精神延伸至处理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中，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不仅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显著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扩大了国际影响。自此，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外界评论愈趋正面。

经27年年均9.6%的增长率的发展，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8.3万多亿元人民币[6]，按可比价格计算约为1978年的12倍[7]，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合2.2万多亿美元，占世界总量44.8

万亿美元的5%，列美、日、德之后，居世界第四位；人均约1740美元，属世界银行划分的下中等收入之列。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中国国内总产值为85727亿国际元，列世界第二位，为第一位的美国124095亿美元的69%，与居第三位的日本39438亿国际元相加约与美国相等；而人均量则为6000多国际元，仅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国家最新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经济又比上年增长了10.5%，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20万亿元人民币，而且各方面专家预测，这种高速增长还将持续若干年。1980年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3倍多，外汇储备更跃升为世界之冠。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发动机之一。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对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15%以上。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中国加入WTO五周年之际对中国履行承诺情况打分为“A+”。中国对世界经济愈益广泛的参与，促使市场经济规则逐步完善，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从有限开放转向全方位开放，更全面、深入地融于全球经济体。

如果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持续下去，在21世纪中叶以前就会成为全球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国家。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估计，到201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世界银行估计，如果中国保持当前的发展速度，2020年，如果美国的GDP是109个单位，日本是43个单位的话，中国的GDP将达到140个单位[8]，那时中国将进入富裕国家之列。不过，中国的既有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10倍多，就人均量而言，那时中国与发达国家比，也还会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按人均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即便在中国和世界不发生特别意外的大逆转的正常情况下，也还得到本世纪下半叶才有望实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成就首先突出地体现在数量的增长上；而更深刻的本质的变化是在经济的结构（所有制构成和产业结构）和运行机制中。

从所有制结构看，实现了自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维持了20多年的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国有与集体所有）向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根本性转变。1978年全国城镇只剩下15万个体从业人员[9]游离于公有制经济体之外，其收入仅供勉强养家糊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开放、复兴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企业经济、港·澳·台、外商投资经济，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中的私人经济部分），与公有制经济合成了包括内、外资，国有、集体所有、私有、股份合作及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相互参股、联营等各种所有制混合的经济体（即多元所有制复合结构）。这种混合经济体各种成分的比重及相互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加上地下经济及隐瞒或虚报成分，统计操作上很难清晰地划分和明确其中每一种成分的准确的实际数量和比重。总的情况看，二十多年来民营经济增长更快。这里须顺便界定一下时下中国流行的“民营经济”概念的外延：一是指广义民营经济，系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统称；二是指内资民营经济，即广义民营经济减去外资和港澳台商经济，包括集体、私营、个体和其他混合经济；三是指狭义民营经济，仅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其中，发展最快的便是私人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步，到2005年已达430万户、业主1110万人，注册资本总金额6万多亿元，占广义民营资本的大半；内资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近一半；广义民营企业纳税额更已超过全国各种经济成分企业纳税总额的四分之三；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占全国五分之四的新增就业岗位[10]。在处于国民经济核心地位、计量相对比较明晰的工业中，200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总量为66425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加值为26063亿元，已不到总量的四成；而在47949亿元的出口交货总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占11.9%[11]。是年底，中央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宣称：国有经济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将保持绝对控制力，包括军事工业、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航空和水运七大行业。这些领域国有资本总量要增加、结构要优化。中央政府“抓大放小”，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简称“央企”）近期内将调整和重组至80~100家，

一些重要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不过，这一表态立即引起了不同反响，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质疑[12]。凡此种种皆体现出中国经济在所有制构成和国家调控手段上的决策和学理上的博弈。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虽然实现了27年年均4.7%的高速增长，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27.9%下降到了2005年的12.6%，下降了1倍多；第二产业的比重维持在47%左右；而第三产业则由24.2%上升到了39.95%[13]。总体上体现出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已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的转型，市场要素和机制的培育已大体就绪。

在政治领域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生活各领域都被高度政治化了。在这个泛政治化的前提下，一切变革便都具有政治性——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思想解放运动，还是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都是政治上的重大的、原则上的突破。不过，迄今为止的政治方面的改革，多是因应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连带的辅助性举措。作为整体改革的主体的政治改革，自1980年代中期试步以来，便一波三折，踟蹰难进。不过，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继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之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已加快脚步。而经济和社会的长足发展，当为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发展打好更坚实的基础。中国目前实行的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即共产党领导执政，八个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参政、议政。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有显著改善，突出体现在：由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逐步演变为现今的集体领导模式，确立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干部终身制已改为任期制。政府的职能正在由以往的“生产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城乡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会等）开始的直接选举制度逐步推广、升级。公民的民主、法权意识逐渐觉醒。网络的普及为民意的表达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搭建了新的平台，人们称之为“网上民主”，其作用和影响日益彰显，意义深远，是观察中国政治民主动态的新看点。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还是得渐进地稳步摸索着推进，取各国之长，走自己的路。

社会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社会构成中阶级阶层的变化。经济的自由，带来了经济收入的差别化，改变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在公有制基础上收入低下的时代形成的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状况。面对社会构成的分化，有的学者以经济收入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成份划分为富裕阶层、中等阶层和贫困阶层；也有学者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的变迁的角度，把社会利益群体分为特殊获利者集团、普通获利者集团、利益相对受损者集团和社会底层集团；还有学者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无论那种划分，经济收入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印证出中国已经从一个财富相对均等的社会变成了一个贫富差别明显的社会。贫富分化、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矛盾加剧，催促社会改革和发展提上了日程。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大幅度增加社会投入，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建设，已初见成效。种种迹象显示：现代公民和公民社会如地平线上的朝日正喷薄欲出。

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强烈地反映在生活方式、意识型态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自我意识觉醒，竞争精神勃兴，新思想、新观念应运而生；人生选择、行为方式日益多样化；对自由、民主、公正、科学、法理的追求渐成社会主流取向。与此同时，则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和损人利己、欺诈之风的疯长。这又引起了各种新、老国粹主义的反弹和沉渣的泛起。于是古今中西各种思潮，走马灯式地浮现、杂陈，互相碰撞，形成生动的混乱、冲突的局面。但就整体而言，社会仍保持了稳定向上发展的局面。

伴随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包括硬、软各方面的综合实力的壮大：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及其良好的劳动素质；悠久的历史积累的丰富文化和求知识于世界，举国上下的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及其智慧

的焕发；富有兼容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探索中的形成及其强劲的发展势头；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与行政机制及其能效的日益优化；国防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深谋远虑而又灵活务实的外交。由于这些要素及其发展势能在当今世界和未来发展中的份量和影响，使得国际舆论对中国的评论和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又生变化：作为“战略对手”的中国，又被加上了“利益攸关方”、“合作对象”、“国际上负责任的大国”等等称谓。“威胁论”也跟着与“机遇论”混成了矛盾的复合——当然，也还得无可奈何地继续尽可能加以遏制、围堵，以阻滞中国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的认识日益全面、深入，对中国的发展趋势的把握日见准确、稳定。但是对许多国外观察者来说，由于中国国情的异常复杂和变幻莫测，“中国始终仍是个谜”。各种杂音，甚至两极化的评论，也还将持续存在和变换。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的评价与时俱升，现已提高到了世界史的划时代的高度。此类评论充斥着世界各种有国际影响的媒体，举不胜举。例如2006年5月25日英国《卫报》上的一篇历史总结性的文章题目就叫做《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1989年是20世纪末的决定性时刻。以撤除柏林墙为标志，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标志着20世纪的结束。“1989年首先是一个欧洲的事件，或许我们在今后很长时间里将发现，它是最后一个既是全球又是欧洲的大事。”1978年本来纯粹是一个中国的时刻，但以后的事态发展，却显示出“它关系到创造一段全然不同的历史。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个世界一直被西方，也就是欧洲和美国所垄断。直到上世纪中叶之前，人们还普遍认为，那些曾经遭受欧洲殖民统治的国家注定处于永久的依附和不发达地位。东亚的崛起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变革已经决定性地使全球重心东移”。“虽然1978年离现在并不遥远，但我们已经沿着这条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道路走得很远”。“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美国世纪就已经结束了。本世纪——或者说本世纪头50年——的主题将是现存超级大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14]。

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大发展的基础和背景下，在不断扩大、深化的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复兴的；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又反过来从学理上支撑了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学术文化的复兴和发展

（一）观念形态的变化

1. 从对农民“松绑”肇始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由在僵化的旧体制下，处于社会最低层的贫困农民为求生存以非法的形式（家庭承包）悄悄搞起来的。这是改革最初在实践中对旧体制的突破。农民的这种自发行动得到体察民情、敢于承担责任的开明地方官员或明或暗的保护和支持，进而为中央所放任，各地创造出了多种突破人民公社制度束缚、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变通形式。农民和农村经济重现生机和活力，并立见成效——农业增产、生活改善。人们将此形象、准确地称之为对农民的“松绑”。

所谓“松绑”既是松束缚农民的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策规定之“绑”，也是松禁锢农民的思想观念之“绑”。而要松被禁锢者之“绑”，便须有权力者（加绑者）自身的思想解放和观念的转变。所以，“松绑”既是民众的解放也是作为国家领导者、执政者的干部的解放。其内容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观念的解放与转变，也就是俗称的“换脑筋”。而观念正是思想文化的灵魂。这样，一个一个地突破，一步一步地升级，便上升、集中到对作为最高圣旨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挑战[15]。而挑战者所用的思想武器却正是毛泽东当年用来向他指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进攻的同一种致胜的武器——

实事求是。

2. 实事求是精神的恢复

“实事求是”语出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本为汉学务实求真的治学方法和优良传统。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将之运用于指导革命的理论研究，作出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而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外延和功能。毛泽东运用这个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有效方法，取得了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策略的真切见解，领导共产党上山下乡夺取了政权，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至高无上、毋庸置疑的权威及对马克思主义随意解释的话语权。于是，“物反于极”，当他达到权力的巅峰时，便走向了反面，背离了原先取得成功的思想路线，俨然成了新的偶像。他的主观臆想和专断成了新的僵化的教条和圣旨，一步步把共产党和共和国拖到了灾难的深渊。要拯救党和国家，把中国的建设事业重新引导到成功之路上来，就得从对毛泽东及其圣旨的新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样，便从对农民的“松绑”由下而上，又从中央由上而下，扩展为全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转变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总设计师”（这是邓小平认可的外界对他的称谓）邓小平的卓越之处，正在于他吸取了原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无可挽回的政治恶果的教训，在毅然决然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拨乱反政的同时，又坚持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既端正了政治和思想路线，又确保了共产党的团结及其执政地位的承续[16]，在稳定中实现如此深刻的变革（邓小平称之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二次革命”）。此后中国的现代化及改革开放在探索中的推进和成就的取得，无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的体现。

实事求是，是两千年中国学术文化研究中锻造出的最根本的治学方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思想武器，也是启动和确保改革开放胜利推进的灵魂。我们在讨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现象时更不能不由此入门，回归正道。

（二）学术研究的复苏与勃兴

学术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精髓。学术水平是代表一定时代社会思想文化水平的指标。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顿之后重新启动的。由于各学科原有的前提基础不同，与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关联度亦有差异，其后的恢复和发展状况既体现出共同性也显现出各自的特征和学科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笔者对各学科的述评也不拘一格，着重点和着墨的多少不尽相同，意在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1. 人文科学的复兴

古代中国的人文社会学说，向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诸子大家多为百科全书式人物，经史子集浩繁叠卷汇成百科全书式典籍。汉武以降，虽倡“独尊儒术”，但同时代问世的一部《史记》，却既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17]。诸子百家的重要人物及其学说尽收其中。《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为社会经济生活之实录，《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则为民族学珍籍。汉、唐更以宏大的气魄吸取异域的文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的传播弘扬。而且，在连绵不绝的悠久的古代史上有过百家争鸣、儒释道的融合，却无因学派、宗教的不同而引发的战争。这是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特点。但是自秦以来所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传统，尤其明清的文字狱，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学术的自由，影响至今，难以脱体。

到了近代，在西学的影响下，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才渐次分立。共和国建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至尊的指导地位，贯穿于哲学社会人文科学各大领域。“文化大革命”中除了个别学科（如离现实阶级斗争较远的考古学，因应急发现而忙碌）外，其它均基本停止了正常工作。

改革开放后，哲学、史学、文学等原有学科及其研究机构立即恢复了研究工作。学者们以重生的解放感和紧迫感立起直追、开拓进取，以弥补被政治运动耽误的时间。

（1）哲学的启蒙：从“斗争哲学”向“和合学”的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处于至尊的地位。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不断强调其党性原则和规范化、普及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不断地向“左”转，“文化革命”中甚至完全转到了它的反面的极端——“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语）的荒唐地步。

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理论上，正是从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最起码的哲学常识开始的。人们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及其它各项事业中逐步恢复了理性。

1978 以来，中国哲学界首先突破了过去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副对子”来判断思想的性质、是非、进步还是反动的简单化模式，从基础性工作开始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逐步进行了改造；此后有的学者仍执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本清源与继往开来，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形态的探讨；有的学者随着实践的发展向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深入，与其他学科结合，对现代化和全球化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展开进行的思考，参与了发展理论的研究（发展哲学）；还有学者面向前沿的研究，对数字化时代的哲学思考导致了虚拟哲学的产生，及对数码鸿沟以及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等新问题的关注。

从趋时的主流理论倾向上看，哲学“战线”上，已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狠批“合二而一”论，大张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开路的“斗争哲学”，逐步转向，在本世纪初，又擎出了为建立和谐社会服务的“和合学”。斗也哲学，和也哲学，头头是道，时时有理，处处有用。

不过，在个人研究上，李泽厚贯通古今的中国思想史的系列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美的历程》及《批判哲学的批判》则是其独立思考的主要成果，在思想上、学术上启蒙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代学子，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难以抹杀的。

哲学的解放既解放了哲学自身，也使哲学的普及宣传教育得以从泛意识形态化和庸俗化的泥沼中渐渐拔出。而原来被哲学尤其极端泛化的阶级斗争学说所取代的各门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得以重新恢复；又如作为哲学研究的附属领域——无神论的对立面的宗教研究，改革开放后，则受益于国家宗教政策的开明化和观念的变革，对宗教的产生、性质和社会作用进行了深刻反思——从长期以来把宗教与迷信相混同和学术上的“宗教鸦片基石论”，将宗教钉在落后的意识形态的耻辱柱上，转变为承认“宗教是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探究宗教的民族性和文化性，重新给宗教做社会定位，从而把宗教研究扩大到了相关的文化领域[18]。2006 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更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宗教新的现实的社会功能。

在哲学专业人士内，对于去泛意识形态化，有人不舍，叹息“哲学的贫困”，有人惋惜哲学的消溶甚至没落。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与学术的解放和走向正常化的体现：哲学回归到它自身的位置，不过是结束了过去那种把哲学膨胀为泛意识形态化的工具、人为的反常的异化。这无论对

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或是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来说，还是对哲学自身的科学定位而言，都是好事。

（2）历史学枯木逢春，返青复荣

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悠久历史，向有“史国”之称，历史学内涵极为丰富。可以说，未经分化的中国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资料多包含于中国古代大历史中。近代中国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多是在西学启发下，从包罗万象的传统大历史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在毛泽东的知识构成中，中国历史也是他最熟悉的领域，他强调古为今用、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实际上是农民粹主义观念。以此为指导，突出农民战争便成了毛泽东时代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中国史学的林莽，被李逵式的板斧劈头盖脸的大批判，削成了瘠三似的枯木。

改革开放伊始，年逾八十的中国科学院长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以重获解放的激情呼唤《科学的春天》。果真，枯木逢春再现苍翠，史学界继往开来，克服了自195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倾向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套用，而坚持了历史主义原则，发扬中国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上溯夏商周断代、中华文明探源，下展共和国史新篇，堪称成果累累。其中通史类的鸿篇巨制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而这些通史研究的续成，又赖于艰苦细致的考证和断代史、专门史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如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吐鲁番文书学等考证的成果，不仅是对相关领域研究的宝贵贡献，也是中国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发现、整理和研究的丰碑。史学的繁荣还体现在过去被冷漠的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另辟蹊径，造就出了一代筚路蓝缕开拓之才。这些方面已有几位专家光临本研究会讲演，本文不再赘述了。

鲁迅纵观中国历史有一个颇具启发的发现，他说：“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19]。中国史学界亦向有“史家面前难定论”之说。尤其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更如走马灯：改朝换代、风潮跌宕、外争内斗、党同伐异，真是惊心动魄、错综复杂。人物和事件各是其是、各非所非，各写各的春秋，要想有一部不偏不倚的公论，本就是痴梦。但总还是有人力图还历史以尽可能客观公正的本相。时下，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引人注意的由袁伟时等南方学者对晚清以来的近现代政治人物和事件重新认识、再评价引发的论争，如果能在相宜的氛围下深入探讨下去，或许会有导致将中国近现代史改写得较为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希望。不过，目前中国的学术气候仍尚属早春——乍暖还寒。

（3）文学创作与研究风云变幻

文学是时代的感应神经。文学的创作和评论（研究），则更直接、更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转型、电子信息传媒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文艺的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政治上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艺术上主张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文革”中更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封、资、修”统统“批倒批臭”，万花纷谢，斯文扫地。

改革开放，春风回暖，大地解冻，带着政治运动蹂躏的痛楚和历史的沉思，“伤痕文学”、暴露作品、知青文学，纷纷破土而出，赢得了社会广泛共鸣。此时的文学评论也因与文学作品、社会心理、时代主流意识的合拍而高扬。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文学批评便失却了其文学的共舞者，也不再为“主流意识”所青睐。尤其令批评家傻眼的是，在转型社会初期孵化出来、在文坛上争相露头、抢占日益

市场化的商机的文学小贩，扯着稚嫩的嗓门使劲吆喝着“表现自我”而推出的各式文化快餐，鄙俗竞秀。逼得一些不甘阿世的文学批评家只好在寂寞无奈中自塑独立性，清高自傲地由政治-社会批评向审美批评转型。

然而避开这种浮躁的喧闹，寂静中对沉重的历史的反思却愈益深沉。往事的追忆，从“文革”，而“反右”，而“土改”，一幕幕事件、当事者的遭际……从时光的邃洞中汨汨溢出，水墨般在纸卷上缓缓浸润扩散开来。这些作品如一株株从岩缝中窜出的青松，曲折苍劲。就笔者所见，其中最入魂的是高尔泰的自述记实《寻找家园》：从江南书香世家的顽童→成为艺术家的“右派分子”→发配北国大漠劳改农场垦荒的囚徒→刑满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体验“文革”炼狱→改革开放后再经波澜辗转→终于漂泊大洋彼岸，回首西顾，到《寻找家园》出版[20]，作者已届古稀之年。作品所展现的这七十年世态变迁，历历在目，使读者感同身受，尤其在世界文化的圣殿莫高窟的佛图面前，文物研究所的众生在“文革”的精神炼狱中的拷问下出壳的灵魂，透过幽默的淡淡白描透露的深沉的道义与人格的抗争，及荒山夕照中追捕黄羊的野性中的人性自审，无论是思想还是审美，都沁人肺腑，令人留连。这些作品包容的是中国刚刚逝去的那一特定时代的内涵，属于过去时。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迅速、深刻、全方位的大变革恰逢全球化，尤其信息革命的迅猛推进，中外的接轨、互动，又使中国文坛上显现出了崭新的世界性的时代特征。现在中国文学界已有些人将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文学命之为“新世纪文学”。并有人就时下中国文坛呈现出的特征从数量上做了这样的概括：“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却少了；作品种数与印数增加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降低了；小说改编影视多了，经得起阅读的却少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小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等等”[21]。

尤其网络写作的喷涌更是近年中国文坛上出现的崭新现象。基于中国信息产业紧跟世界潮流的超常发展和教育的迅速普及与提高，互联网上网人数截至 2006 年 6 月已达 1.23 亿，约相当于日本的人口总数。在网络平台上，崛起了发展异常迅速的网络文学及其文学爱好者（作者、读者、评论者及兼任者）自由自在地创作、评论、交流，已造出了良莠不齐、互相砥砺，甚至混乱的局面。其中也有脱颖而出，成为流行时尚文学的新秀；有的作为文学生态园的杂草——即便是“毒草”，沤成泥，也可做护花的养料。因为混乱，引起担忧；因为生动，而具有活力。无论别人怎么评说，它却仍不管不顾地疯长。其中最新的一代就是 1980 年代以来出生，对着荧屏里的虚拟空间长大的年轻作家，被称为“80 后作家”。他们的小说所表达的在家长们寄予厚望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内心孤独的读白，深深地吸引着青少年读者群。无论是作者、作品还是读者，与其前辈（父母、老作家、评论家）处处都显示出互相难以理解的心理障碍——作为文学现象，这里且把它叫做“文学代沟”。这种现象不仅在当今中国文坛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媒体留意的对象[22]。

从总体上看，自上世纪末以来，许多读者已经从书本转向了荧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国民上网阅读率（狭义，下同）1999 年为 3.7%，到 2005 年上升至 27.8%，现仍呈高比例增加趋势。相反，同期的国民图书阅读率这 6 年间却持续走低，由 1999 年首次调查的 60.4% 下降到 2005 年的 48.7%[23]。报纸的发行量和读者人数仍持续走高，总量均为世界之冠。中国现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国民文化水平整体的提高，社会运转节奏加快，利用空隙，看看小报上的文化小品，便成为一种方便的随意选择。

这种扑朔迷离的现象及各种思潮，把旧的理论教条逼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冲击得东倒西歪。传统的批判家们缩手无策，惶惑了。但是，有作为的文艺理论家们则一方面利用新技术手段，对丰富的文学遗产积累进行梳理、研究，建立日益充实、完备的数据库，为文艺理论的深化和创新提供更厚实的基础；同时，直面国内外现实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潮，尽力融合古今中外，积极推进文艺创作和文

艺理论研究的前进。

2. 社会科学的繁荣

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主要指经济、社会、政法等领域的学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些方面的知识都有丰富的积累，近代以来才在西学启发下从传统学术中分化出来各个独立。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遭遇了不同命运。改革开放后在社会经济的全面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先后实现了学科的转型、复兴和重建，并在改革和发展的不同领域发挥了各自的与合成的功能。

(1) 经济转型与经济学的繁荣

经济是整个社会系统存在的基础。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首先也是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从宏观上中国已大体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从反映经济发展速度的经济总量的增长看，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年至2005年的27年间年均增长率达9.6%；从反映经济属性的所有制结构看，实现了自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后维持了20多年的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从反映经济素质的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看，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显示出从总体而言，中国已经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迈入了中期阶段。同时，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提高、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也都是经济素质提高的显著体现。

上述三大方面的转变和推进都是根本性的、极为深刻而迅速的。这一伟大的系统工程启动的领导者、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及其理论。同时，在实施和推进的实践过程中，经济学家和改革者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在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学理支撑的同时，也造就了经济学的繁荣，并为中国和世界，做出了真正突破性的贡献。

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初期，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除技术进步外，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利润的增加，主要是靠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残酷的剥削激化了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上的劳资矛盾——即产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面对这种社会危机，学者们通过分析诊断，开出了两类药方：一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的理论；二是在既存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改良，以维持生产的发展，逐步扩大社会民主，促进社会正义和福利共享，使社会走上良性运行的改良主义的理论。革命论与改良论的互动关系贯穿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和二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长期斗争中。一些先发展国家即现在的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先发展优势所具有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有利条件，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尽力吸收包括社会主义内容的改良的要求和建议，不断调整，克服了一个个社会危机，甚至渡过了革命和战争的惊涛骇浪，而建成了相当人性化的福利社会，如西欧和北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或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而以苏联为首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剥夺了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国家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凭着集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尤其在二战取胜后，又乘势扩大了社会主义影响，建立起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此后在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在竭力增强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中，耗去了过多的人力、物力，更难以理性地正视和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成果，来自我调整、充实、发展，沿着这样的僵化路子走下去，天长日久，民生受损，民主受压，民心渐失，“社会主义优越性”空虚化，终于在“冷战”中败北——首先是败在软实力的虚脱——掉过头来，反做了资本主义的俘虏和尾巴，失却了社会主义的基业。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走的是苏联的道路，由于中国经济底子更薄，“文革”更“左”，问题暴露得也更深刻。邓小平正是在“文革”下放时期的深沉

的对现实的和历史的、中国的和世界的反思中,吸取中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构想。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长期形成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观念和改革开放启动后仍纠缠不清的争论,邓小平为打消重重顾虑,用每一个中国人部听得懂的务实的“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着前进)和“猫论”(即“不管是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引导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但改革开放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领域(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观念等)的推进是不平衡的,自然会引发一些摩擦和冲突,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风波后,“左”的又回潮。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出来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针对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他重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经验”。并郑重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他总结中共的历史经验教训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24]。之后,又由懂经济、铁面无情的朱镕基入主国务院,把握着中国经济巨轮,乘风破浪前进——海外评论因此给了朱总理一个“经济沙皇”的称号。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绩、国力的增强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的繁荣也首先体现在经济学领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建设和一系列观念转变的启蒙;吴敬琏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学术督导——由于他在这方面的执着和贡献而获得了公认的“吴市场”的称号;林毅夫带着台湾经验和国际眼光潜心于农村经济研究,不断献计献策,为政府采纳上升为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性方案。他们是群星灿烂的中国经济学界三代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反映在广大民众的观念上,据经常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马里兰州大学进行民意调查的Globe Scan公司,2006年在20个国家里就“自由市场经济”进行的一次意见调查结果,发现中国74%的民众认为“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体制”,这一比例超过了所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71%)、英国(66%)和德国(65%),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拉美国家[25]。可见,无论就经济转轨和发展的速度,还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及国民的经济意识的转变,都走在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的前头。

虽然说邓小平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挂上了“不争论”的免战牌,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和发展启动以来,面对改革和发展层出不穷的各种矛盾的显现,围绕发展模式和具体对应政策的争论却并未停息,只是伴随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和扩展,各个阶段讨论的具体问题、热点和代表人物有所不同,观点也有所变化,但贯通至今的中心主题仍是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同时,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效应,引发的矛盾、问题和争议,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连带扩展到社会、政治和文化各相关领域,形成为整体性社会大变动,并成为推动这些领域学术复兴和发展的根基性动力。

富有成果的发展伴随着富有成果的探讨,凝聚于“科学发展观”。

(2) 绝学逢生 社会学重建

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来,中国社会学更是命中多桀。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有关人际关系和社会管理的内容,人们称之为群治之学或治群之术,简称为群学。

近代西方Sociology传到东方后,中国初译为群学(严复《群学肄言》等),日文译为社会学。在20世纪初中国也采用了这一日文汉字的释名,立足于国学的深厚土壤和中国的社会实际,借鉴西方

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和发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学，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调查研究及乡村建设试验等诸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和进展。

社会学与社会变动休戚与共。当以社会改良为特征的西方社会学伴随并服务于西方社会的改良而发展的时候，以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为指导在俄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便于上世纪30年代把社会学笼统地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废除了。故以苏共和苏联为榜样的中共在建国后不久，在仿照苏联教育体制进行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也将社会学废除了。于是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便成了绝学。

“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便于1979年3月紧迫地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并特别指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26]。将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离出来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更具体说明：“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社会是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生活、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社会生活的发展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首先就是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主义为我们研究大量的长远的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但它并没有也不会代替关于社会现象具体研究的科学”。这才为社会学平了反、正了名。于是，社会学在中国大陆才得以应运重生[27]。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复兴是与中国和世界闻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00~2005年）的名字分不开的。他青年时代以《江村经济》而成名，晚年主导重建中国社会学，又继往开来，从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研究出发，逐步延伸扩大到东西南北自然、人文条件各异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科学结论和建议并被纳入国策，为中国的现代化尤其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8]。

重建以后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化这一中心主题展开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模式、战略、步骤及方法的探索与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共同参与的大课题。就社会学而言对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已形成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复合的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面非常广泛，其中较为突出、意义重大、与民生攸关的为转型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支撑的框架为阶级阶层结构。在改革开放前依存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被简化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干部）。城市化和社会流动度低，基本上仍是一个静态的“金字塔”形的传统型社会。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促成了中国社会空前规模的整体性大变迁：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出现及其构成的演变、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复杂化及结构比的变化，城市化和社会流动空前加剧，原有社会结构迅速解体，社会的阶层分化，不同利益的群体和集团的形成和演变，呈现出了“洋葱头”形状的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的雏形。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分层方法，前面在背景综述中已提及。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课题组”在2001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一《当代中国十大阶层》，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的要项，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做了总体分析，划分成十大阶层，从上到下依次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该报告一发表便引起了热烈反应，尤其对仍沉睡在传统的“阶级意识”中的部分守旧人士的震撼更强。笔者也即时就此发表了评论[29]，不再赘述。四年之后，该课题组又推出了第二部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30]，其主题是：当

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怎样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分化演变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十大社会阶层今后各自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怎样的改革和调整。该报告撰稿人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综合分析了国内外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在吸取前人资料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地、历史地、准确地描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五次社会流动过程；动态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各阶层的演变和各阶层之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整体格局。该书封底直书：“探社会之进程，究阶层地位之沉浮，知个人之命运，谋国家社会之未来。”诚如斯言，该书无论是对中国的当政治国者，还是对想了解中国社会的学者把握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都是值得一读的。

改革开放前的短缺经济条件下，广大民众过着物质匮乏、精神压抑、单调简朴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生活资料日益丰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的扩大、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迅猛推进等等各种条件和因素，造成人们尤其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剧变。这些变化涉及到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使与其切身生活关联度最高的如婚姻、家庭和性问题的讨论，成了参与人数、举办研讨会、出版刊物和书籍最多的领域。其内容十分庞杂和世俗化，观点歧义，水平参差，要从学术上做精当的概括实在一言难尽。幸而本中心文化研究会举办的研究会上已有几位民族、民间和民俗文化研究的学者从不同视角作了有关的专题报告，从中我们至少可见一斑。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报告，不仅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也吸引了国际社会学界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参与。2004年盛况空前的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成了中国社会学从“绝学”复兴为“显学”的见证。

（3）政治改革与法制建设给政治学与法学研究出难题

政治学与法学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政治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政治的硬件。在此，我们一并述评。

与社会学一样，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学研究也经历过一个被否定而又重新复苏的曲折过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政治学遗产十分丰富，积累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国家长期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经验，并且大部分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而近代西方政治学则是在清末维新运动中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据不完全统计，1948年时全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1952年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院系调整，取消了中国所有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由此政治学在新中国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与社会学不同的是，原有的政治学的课程如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国家问题、比较宪法等等，并没有被取消，而是移到大学法律系去讲授。1960年中苏两党论争时，为了培养能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又在一些大学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是主要讲授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等），以后又集中几所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力量启动了国际政治系的教学和研究。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高度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另一方面却乘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论，国内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反而成了研究回避的禁区。其结果是，诸如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不同程度的盲目之中，许多重大政治决策和施政行为往往随毛泽东的主观随意性所左右，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一意孤行，在政治实践中屡碰钉子、犯错误，直至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灾难性的后果[31]。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

党领导一切”，社会生活高度泛政治化。因此，改革的每一步举措也必然会处处触动敏感的政治神经。从这个对应的意义上说，作为系统工程的改革也就具有泛政治性了。尤其改革首先是把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上，而经济发展又是从突破被认定为“社会主义”的金科玉律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这正是对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深刻变革。所以，从泛政治化的角度看，整个改革都是政治的，而且是根本原则性的。

从严格的政治范畴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改革首先是从执政的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入手的，进而推进到改革并完善共产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这一政治改革的思路和要点呈现于邓小平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这篇讲话深刻地分析了毛泽东晚年个人专断所犯错误的制度原因。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更发人深思的是，邓小平在这里还进一步直白地联系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2]。此后的政治改革，基本上是循着这篇由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讲话的思路和要点在实践中摸索着推进的。

虽然主要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及其他传统的和现实的制约因素的作用，政治改革步履维艰，中途出现过反复、徘徊，比起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的速度来，人们多有政治改革和建设滞后的感觉。但是我们总体梳理、盘点一下二十多年中国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上的成果，仍然是相当可观的：首先，国家干部领导职务终于实现了由终身制向任期制的转变，执政方式正逐步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逐步扩大、充实；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已有法可依；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决策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先后提上了日程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民主法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正逐步成形；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和政府的行政能力显著提高。这些政治进步和公民个人自由的扩大，是大众都能切身感受到的。

当然，这些进展都仅仅是初步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正面对着各种现实的难题：民主制度还不健全，公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法律不完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乏力、欠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提高[33]。这些难题的破解都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智慧和时间。譬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已28年，市场发育已显现成效，“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已纳入修改后的现行《宪法》，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的《物权法》，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匹配，经12年争议，其草案在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程序7年磨蹭后，才于2006年进入“五审”，具体进展如何，仍然充满悬念。这一方面反映出了立法过程的民主化，同时也体现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观念和学识水准的差异和交锋。

从学科发展上看，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梳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复兴了传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文化大革命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反思，对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过积极的回应。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面临着政治学又一次陷入攸关存亡的境地，政治学者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功能定位，再次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第三阶段为

20世纪90年代初至现在,政治学开始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学向科学化的政治学转化[34]。

与同时复苏的社会学相比,一波三折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显得步履蹒跚,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学的要求更不适应。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它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中最具现实敏感性的学科,因而经常会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例如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因卷入风波之中而流亡国外,所刊《政治学研究》(1985年创刊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杂志)、《国外政治学》(1984年创刊,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研究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被停刊,政治学所的存亡甚至都成了问题,重建不久的政治学研究又一次陷入低潮,不得不为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寻找依据。只是得益于其后经济改革的深入所引发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大潮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释的与政治学有关的课题,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型等等,才再一次救活了濒临危亡的政治学研究。1995年《政治学研究》杂志复刊,标志着政治学研究的复苏。同时,社会的需求也再一次复活了国外政治学理论的引进热,借鉴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实政治,从而促进了政治学研究的理性化、现代化。

幸而,在中国,首先是共产党内确确实实有着这样一些当年抱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爱国理想参加到革命行列,而后虽饱受挫折、打击、“改造”和蹂躏,仍坚持着自己的政治气节,而且由于有切身的个人、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痛苦经验和深刻反思,使他们愈到晚年愈加坚强、老练。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1923~2003年),不仅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的组织领导者,更是民主政治启蒙的领军人物、青年的良师益友。生命不止,呐喊不息。在他去世前一月,笔者曾有幸同友人与他进行过他别世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他犀利的言辞至今音犹在耳。他去世后,为他的道义精神所感的友人们出版的《怀念李慎之》(上、下集)的封底上印着他对新世纪的寄语:“我愿以民主价值确立为全球价值来祝福二十一世纪”[35]。这正是中国和人类的福音。

在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钢主编的10卷435.5万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可谓是中国政治学领域的鹤立鸡群的鸿篇巨制、对得起祖宗的力著。而面对现实,处境尴尬的中国政治学界却还只能汗颜。

目前的中国政治学研究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加快政治学的科学化建设,以实现与国际政治学的接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各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会出现一些带有共性和规律性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些具有共同性和规律性的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是这一任务的主要内容。二是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除了上述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共同性与规律性之外,各国的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还会因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各具不同的特点,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未必能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有用工具,更是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内容。要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除了学者们自身的努力之外,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条件,当政治还远离宪政民主的时候,现代政治科学是难以阔步前进的。

政治是社会经济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将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述中国政治及其研究的状况倒正好集中体现了这个现实。

当然,政治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尤其处在社会大转型和迅速发展中的国度。综观邓小平复出以来的中国政治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其长远目标是要从中国不断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吸取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先进政治经验的长处,“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6]。“更高”,现在还谈不上,不过“初级”而已;但“更切实”,却已见端倪。改革开放以来28年的发展成就即为最切实的证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既已取得的进展,开创了一种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初步成功的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示范和鼓励作用;作为与西

方文化异质性最大的东方文化的发源地，中国从包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内的各种因素构成的国情出发，取各国之长，走自己的路，树立了非西方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新典型；作为按自己的渐进改革的方式，摸索着稳妥地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能出色地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市场经济机制日臻完善的国家，中国又为象越南等同类原来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革新）提供了切实、成功的参考。

所有这些都切切实实地摆在世人面前，有目共睹——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是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并对他们思考人类和各国的发展以新的启发。如1989年以《历史的终结》一鸣惊人的日裔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当时断言：“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是二战后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下面这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而且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他曾是在理论上支撑布什主义的鹰派。但是在美国对伊拉克的一塌糊涂的战争后，他却表示了与新保守主义者的决裂。“布什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认为可以通过运用权力和意志，即使用武力来推动历史达到自由民主目标。福山在2006年3月出版的新书《新保守主义之后：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中写道：“我已经得出结论，新保守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象征还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已经演变成了某种不能再支持的东西。无论它的复杂根源是什么，它已同实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单边主义和美国霸权结合在一起”。他从现实中由“民主”的异化而引发的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大量事实的教训中，反省出对民主的要求和改革必须来自一个国家的内部，而不能由外来者强加给一个不想要民主的国家的结论。促进民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等待经济和政治条件的逐步成熟。“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这几乎就是在为中国的民主建设的理论、主张和操作程序背书。因此，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不值得吃惊了[37]。

中国改革开放28年来各方面的进步和成就是显著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经济发展使短缺经济条件下的民生用品的匮乏已为繁荣的市场所取代，但粗放式的高速经济增长却加剧了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本来发展条件较好、市场经济要素发育较快的东部地区城市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同时也就更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尤其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造成了地区间国民收入、生活水平和心理失衡的加剧；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有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产业结构的升级等经济基础的变化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加速了社会流动、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日益增加的需求和保障力量，但执政者和一般民众普遍缺乏社会发展的意识和思想准备，社会发展的决策和施政不力，使社会发展、尤其农村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及引发的问题日趋严重；综合国力的增强、独立自主灵活务实的和平外交和对国际民主原则的诉求，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赞誉，同时这种磅礴的发展势头，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抱有敌对成见的一些国家恐慌，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煞费苦心的遏制伎俩还在不断翻新。面对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中国领导者及时总结、吸取各方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在2003年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2005年和2006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和六中全会，又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共中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些建议和决定经代表大会通过后正在着实施行：在经济建设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政治建设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依法治国，实行更加广泛的社会参与；在文化建设上，进一步确立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体系，促进和繁荣多样性的文化事业；在社会建设上，加大投入，逐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协调好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把社会公正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并将这种处理内政的思维延伸到外交，

推动构建和谐亚洲、和谐世界。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与学术复兴的互动关系。

三. 结语：几点感想

第一，中国学术研究复兴以来，研究人员焕发活力，立起直追，扩充队伍、培养新生力量，承前启后，不断开拓新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发展速度快、规模壮观，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一些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及时而有效的学理支撑。在考古学、发展经济学等重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与发现已走到世界的前沿，值得高度评价。但各学科发展颇不平衡，研究人员良莠不齐。急剧膨化的浮躁气氛，亟待沉静下来，学者和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才有望更加坚实——毕竟终归只有坚实的才能站得住。

第二，重新启动的中国学术研究在指导思想，由竭力追求“革命性”、“阶级性”与“党性”转向科学性、建设性与现代性，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得以初步恢复；学术讨论活跃，有些学者面对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亦能各抒己见，有些甚至是持续的、激烈的论争。但是有的论者知识和理论陈旧，有的食洋未化、生搬硬套。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下硬功夫，进行理论创新，提高学理水平和说服力，乃当务之急。

第三，伴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对学者有形无形的思想束缚有了不同程度的放松，思想较为解放的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学术个性开始显现，学术生态趋向多样化，从而造就了学术的繁荣。同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领域的现象仍相当严重，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和种种风波中，落败被“淘汰”出局的往往是耿直、书生气较重的道义之士；而事后获利者则往往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政治油子，他们乘机补缺、迁升后，便鱼目混珠，操弄权术、玷污学术，凡是这种人成气候的单位和部门没有不腐败、在学术上贻笑大方的。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学术交流勃兴，大大扩展和深化了中外学术界对彼此的了解，开阔了视野，促进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合作研究中互相学习、启发、帮助，共享成果，彼此受益良多。中国学术研究已与世界接轨，但迄今与发达国家交流频繁，而与发展中国家交流相对较弱，现正在逐渐加强，以使学术交流的全球化更臻完善。

注释：

1. 张琢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6》，第2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5月。
3. 朱之鑫主编：《国际统计年鉴2002》，第4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10月。
4. 见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78~27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由于用各国不同的各汇率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比较，往往低估或高估了其实际购买力；而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调整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则更符合实际，其计量单位被称为国际美元或简称国际元。在美国，国际元与美元等值，即1国际元与1美元的购买力相当；在其他国家，则因各国与美国的物价差而异。这种购买力平价法，在操作上因选择的样本、依据的数据和估算的方法不同得出的数值有些出入，但大体结论一致。此法在进行国际对比中较为广泛接受。由于各国的物价和汇率都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在折算时须相应动态地把握。现时段，在中国大陆，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即1国际元约合2至2.5元人民币；又由于中国国家大，各地发展不平衡、物价差距也大，如在内陆贫困地区，劳动力和产品价格更低，1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便与1国际元差不多。本文在按名义汇率换算出美元数的同时，在进行国际比较的场合，亦采纳购买力平价法数据，以供参考；在进行中国国内发展比较时，则仅用中国国内人民币统计数。
5.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6. 《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实现价总量为183085亿元》，《人民日报》2006年8月31日。

7.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2006》，第 24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 5 月。
8. 见蔡昉、林毅夫著《中国经济》，第 12 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 1 版，2005 年 6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9.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第 8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10. 参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黄孟复、胡德平主编：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11.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 2006》，第 133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年。
12. 许小年：《解析“七大行业”》，《南方周末》2007 年 1 月 4 日。
13.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06》，第 58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
14. 马丁·雅克：《如果说 20 世纪止于 1989 年，那么 21 世纪始于 1978 年》，载《卫报》（英），2006 年 5 月 25 日。
15.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 年 5 月 24 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8~39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16.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 12. 1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40~153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
17.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 9 卷第 4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18. 参见余敦康、吕大吉、牟中鉴、张践：《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19.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 3 卷，第 50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20. 高尔泰：《寻找家园》，花城出版社 2004 年 5 月。
21. 文波：《近年来我国文学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 年 4 月 27 日。
22. 参见丰田雄二郎《中国青少年迷上“80 后作家”》，日本《东京新闻》2006 年 8 月 23 日。
23. 《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耐人寻味》，《报刊文摘》2006 年 4 月 26 日。
24.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 1 月 18 日~2 月 21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383 页，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25. 参见杜平《任何外来的都能变成中国的》，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 年 8 月 18 日。
26.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81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2 版。
27. 张琢：《中国社会学的复兴》，载《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28. 参见爱知大学交流学会编《文明 21》第 15 号《费孝通先生追想特辑》，2005 年 12 月。
29. 张琢：《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载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中国 21》第 17 号，2003 年 11 月。
30.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31. 参见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 年第 2 期
32.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3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2 版。
33. 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2005 年 10 月 19 日。
34. 孙关宏、蒋一澄：《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走向：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通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6 卷第 6 期，2005 年 12 月。
35. 《怀念李慎之》（上、下集），由李慎之生前友好自愿捐资印刷，谨作纪念，概不出售，2003 年 5 月。
36.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2 页，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 2 版。
37. 参见《他为何要背叛新保守主义——英报分析著名学者福山思想演变过程》，新华通讯社编《参考消息》2006 年 3 月 25 日；周琪《福山对“布什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理念的抨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 年 4 月 11 日。